

党 費

王鳳堅著



出版說明

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紅軍游击队 and 老根据地的人民，外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，內遭蔣介石白匪軍疯狂的“清剿”，处境十分艰苦。这个集子內的五个短篇，就是描写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长征以后，留在老根据地的山区游击队和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，其中一篇則是描写在“皖南事变”时新四軍同人民的血肉关系。

这五个短篇，尽管它們的内容、情节、人物各不一样，然而，它們却同样表现了中國农村的农民对党领导的革命的忠誠和热爱，他們在对敌斗争中都显得十分沉着、机智和英勇。如《党費》中因凑合成菜繳党費、掩护同志而牺牲自己的女共产党员黃新；《粮食的故事》中，农民共产党员郝吉标牺牲了自己的兒子紅七，把粮食送上山去支援游击队；以及《老媽媽》中的革命母亲老媽媽，《小游击队员》里机智勇敢的樟伢子，《三张紙条》里和人民軍隊結成血肉关系、“这颗心算紅透了”的老农民程元吉等等。——他們都是一些极其平凡的普通人，但他們都有着非常美丽的性格和极其崇高的革命品質；通过作者所描写的这些男女老小的生动的形象，我們可以看出：正是党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斗争，是他們的沉着、机智和英勇的力量的源泉。

这五个短篇都有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。作者善于从斗争生活中的一个片段、巨大的事变中的一个小节，来刻画一个特定的人物形象，而又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，使生活更集中，人物形象更鲜明，性格更突出。这样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更强了。但这也由于作者有丰富的生活感受，能在广阔的生活经验中，创造出这些可歌可泣、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并使它深刻地教育着我们每一个人。

本书曾收入《解放军文艺丛书》，一九五六年七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，现由我社根据原版经作者略加修订后重排印行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1958年12月

目 次

党費.....	1
粮食的故事.....	12
老媽媽.....	29
小游击队员.....	49
三张紙条.....	66

党 费

每逢我領到了津貼費，拿出錢來繳黨費的時候；每逢我看着黨的小組長接過錢，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錢數的時候，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熱，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。

一九三四年是我們閩粵贛邊區鬥爭最艱苦的開始。我們那兒的主力紅軍一部分參加了“抗日先遣隊”北上了，一部分和中央紅軍合編，準備長征，四月天就走了。我們留下來堅持敵後鬥爭的一支小部隊，在主力紅軍撤走以後，就遭到白匪瘋狂的“圍剿”。為了保存力量，堅持鬥爭，我們被逼迫得上了山。

隊伍雖然上了山，可還是當地地下鬥爭的領導中心，我們支隊的政治委員魏杰同志就是這個中心縣委的書記。當時，我們一面瞅空子打擊敵人，一面通過一條條看不見的交通綫，和各地地下黨組織保持着聯繫，領導着鬥爭。這種活動進行了沒多久，敵人看看整不了我們，竟使出了一個叫做“移民并村”的絕着：把山腳下、偏僻的小村子的群眾統統強迫遷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。敵人這一着來的可真絕，切斷了我們和群眾的聯繫，各地的黨組織也被搞亂了，要堅持鬥爭就得重新組織。

上山以前，我是千偵察員的。那時候整天在敵人窩里逛蕩，走到哪里，吃、住都有群眾照顧着，瞅准了機會，一下子給敵人個

“連鍋端”，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，真干得痛快。可是自打上了山，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，日子不那么惬意了：生活艰苦倒不在話下，只是过去一切生活、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，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，可真受不了；浑身有劲没处使，觉得真憋得慌。

正憋得难受呢，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，要我当“交通”，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联系。

接受了这个任务，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。当然，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。任务是秘密地把“并村”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，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——游击队的联系，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。去的落脚站八角坳，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，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在那里去。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，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，一九三一年入党的。一九三二年“扩红”的时候，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。以后，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，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姪儿。敌人实行“并村”的时候，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，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。听说她在“并村”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，是个忠实、可靠的同志，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，传达县委的指示，慢慢展开活动。

这些，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。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，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，我并不认识。魏政委怕我找错人，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：“你记着，她耳朵边上有块黑痣！”

就这样，我收拾了一下，换了身便衣，就趁天黑下山了。

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，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，下半夜才赶到。这庄子以前我来过，那时候在根据地里象这样大

的庄子，每到夜間，田里的活干完了，老百姓开会啦，上夜校啦，鑼鼓喧天，山歌不斷，鬧得可熱火。可是現在呢，鴉雀無聲，連個火亮兒也沒有，黑沉沉的，活象個亂葬崗子。只有個把白鬼有氣沒力地喊兩聲，大概他們以為根據地的老百姓都被他們的“并村”制服了吧。可是我知道這看來陰森森的村莊里還埋着星星點點的火種，等這些火種越着越旺，連串起來，就會燒起漫天大火的。

我悄悄地摸進了莊子，按着政委告訴的記號，從東頭數到第十七座窩棚，蹣手蹣腳地走到窩棚門口。也奇怪，天這麼晚了，里面還點着燈，看樣子是使什麼遮着亮兒，不近前是看不出來的。屋裡有人輕輕地哼着小調兒，聽聲音是個女人，聲音壓得很低很低的。哼的那個調兒那麼熟，一聽就聽出是過去“擴紅”時候最流行的《送郎當紅軍》：

.....

五送我郎當紅軍，
沖鋒陷陣要爭先，
若為革命犧牲了，
偉大事業依繼承。

.....

十送我郎當紅軍，
臨別的話兒記在心，
郎當紅軍我心樂，
我作工作在農村。

.....

好久沒有聽這樣的歌子了，在這樣的時候，聽到這樣的歌

子，心里真觉得熨贴。我想得一点也不错，群众的心还红着哩，看，这么艰难的日子，群众还想着红军，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。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？要不，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？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。我在外面听着，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、对丈夫的思念，可是不行，天快亮了。我连忙贴在门边上，按规定的暗号，在门的上半截敲了两下，下半截敲了三下，当中敲了一下。

歌声停了，屋里顿时静下来。我又敲了一遍，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，一个老妈妈开了门。

我一步迈进门去，不由得一怔：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，有两个女的，一个老头，围着一大筐青菜，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。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，象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。这一来我可犯难了：到底哪一个是黄新？万一认错了人，我的性命事小，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。怔了一霎，也算是急中生智，我说：“咦，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？”

这一着很有效，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。我眼珠一转，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。我一步抢上去说：“黄家阿嫂，不认得我了吧？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！”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，原来这块儿“白”了以后，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。

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，可着实机灵，她满脸堆笑，象招呼老熟人似的，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，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：“这么的吧：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；盐，等以后搞到了再分！”

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，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，悄悄地走了。

她也跟出去了，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。这功夫，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，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、地下党员的家：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，靠北墙，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，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，小鼻子翘一撮一撮的睡得正香。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。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，这就是她煮饭的锅。再往上看，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，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……。

正打量着，她回来了，关上了门，把小油灯遮严了，在我对面坐下来，说：“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，最近才联系上的。”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，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：“以后再来，先从那里瞅瞅，别出了什么岔子。”——看，她还很老练哪。

她看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，倒象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。头发往上拢着，挽了个髻子，只是头发嫌短了点；当年“剪了头发当红军”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。脸不怎么丰满，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，看去是那么和善、安详又机警。眼里潮润润的，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，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。

半天，她说话了：“同志，你不知道，跟党断了联系，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真不是味儿啊！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，咱们红军遭了难处，也知道该斗争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，现在总算好了，和县委联系上了，有我们在，有你们在，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！”

本来，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，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，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，听了她的话，她是那么硬实，

口口声声談的是怎么坚持斗争，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，我还有啥好說的？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談任务了。

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，她驚地象想起什么似的，說：“你看，見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，該弄点东西你吃吃。”她揭开砂罐，拿出两个紅薯絲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，又拉出一个破壞子，在里面掏了半天，摸出一块咸蘿苕，递到我脸前說：“自从并了村，离山远了，白鬼看得又严，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，你們可受了苦了；好的沒有，湊合着吃点吧！”

走了一夜，也实在有些餓了，再加上好久沒見盐味兒了，看到了咸菜，也真想吃；我沒怎么推辞就吃起来。咸菜虽說因为缺盐，腌得带点酸味，吃起来可真香。一吃到咸味，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們那些黃瘦的臉色——山上缺盐缺得凶哪。

一面吃着，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，传达了一番。县委指示的問題很多，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、組織反收租夺田等等，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。她一边听一边点头，还断不了問几个問題，末了，她說：“魏政委說的一点也不假，是有困难哪，可咱是什么人！十八年^①上刚开头干的时候，几次反‘围剿’的时候，咱都坚持了，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！”她說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，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。

我們交換了一些情况，鷄就叫了。因为这是初次接头，我一时还落不住脚，要趁着早晨霧大赶回去。

在出門的时候，她又叫住了我。她揭起衣裳，把衣裳里子撕开，掏出了一个紙包。紙包里面是一张党証，已經磨損得很旧了，

① 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，即一九二九年。閩西根据地的革命政权，大都是一九二九年“夏收暴动”以后建立的，所以当地群众多用“十八年”作为翻身的分界綫。

可那上面印的鐮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鮮紅鮮紅的。打开党証，里面夹着两块銀洋。她把銀洋拿在手里掂了掂，遞給我說：“程同志，这是姪她爹出征以前給我留下的，我自从‘井村’以后好几个月也沒繳党費了，你帶給政委，积少成多，对党还有点用处。”

这怎么行呢，一来上級对这問題沒有指示，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，少家沒业的，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，也得准备着点用場。我就說：“关于党費的事，上級沒有指示，我不能帶，你先留着吧！”

她見我不帶，想了想又說：“也对，目下这个情况，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！”

繳党費，不繳錢繳实用的东西，看她想得多周到！可是誰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話上头呢！

过了半个多月，听說白匪对“井村”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，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們，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組織受些損失。于是我又帶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。

一到黄新同志的門口，我按她說的，順着牆縫朝里瞅了瞅。灯影里，她正忙着呢。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，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給我吃的那个破坛子，有腌白菜、腌蘿苣、腌蚕豆……有黄的，有綠的。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，放进一个大筐里。一边整着，一边哄孩子：

“乖姪子，咱不要，这是媽要拿去卖的，等媽卖了菜，赚了錢，給你买个火烧餅……什么都买！咱不要，咱不要！”

姪兒不如大人經折磨，比她媽瘦得还厉害，細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，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媽的身上。大概也是輕易不大見油

盐，两个大眼轆轤轆轤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，饞得不住地咂嘴巴。她不肯听媽媽的哄劝，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媽的衣服要吃。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墘子口上，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墘子里去，用指头沾点盐水，填到嘴里吮着；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，就往嘴里填。她媽一扭头看見了，瞅了瞅孩子，又瞅了瞅籃子里的菜，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。孩子哇的一声哭了。

看了这情景，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就敲了門进去。一进門我就說：“阿嫂，你这就不对了，要卖嘛，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，別屈了孩子！”

她看我来了，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，长抽了一口气說：“老程啊，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？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貴，哪里有咸菜卖啊！这是我們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，想交給党算作党費，兴許能給山上的同志們解决点困难。这刚刚凑齐，等着你来哪！”

我想起来了，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們在摘的青菜，就是这咸菜啊！

她望望我，望望孩子，象是对我說，又象自言自語似地說：“只要有咱的党，有咱的紅軍，說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！”

我看看孩子，孩子不哭了，可是还围着个空墘子轉。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，說：“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，我宁願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讓孩子受苦！……”

我的話还没有說完，忽然門外一陣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人跑到門口，輕輕地敲着門，急乎乎地說：“阿嫂，快，快开門！”

拉开門一看，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見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。她气喘吁吁地說：“有人走漏了消息，說山上来了人，現在，白鬼来搜人了，快想办法吧！我再通知別人去。”說罢，悄悄地走了。

我一听有情况，忙說：“我走！”

黃新一把拉住我說：“人家來搜人，還不圍個風雨不透？你往哪走？快想法隱蔽起來！”

這情況我也估計到了，可是為了怕連累了她，我還想甩開她往外走。她一霎間變得嚴肅起來，板着臉，說話也完全不象剛才那麼柔聲和氣了，變得又剛強，又果斷。她斬釘截鐵地說：“按地下工作的紀律，在這裡你得聽我管！為了黨，你得活着！”她指了指擱樓說：“快上去躲起來，不管出了什麼事也不要動，一切有我應付！”

這時，街上亂成了一團，吆喝聲、腳步聲越來越近了。我上了擱樓，從樓板縫里往下看，看見她把菜籃子用草蓋了蓋，很快地抱起孩子親了親，把孩子放在地鋪上，又霍地轉過身來，朝着我說：“程同志，既然敵人已經發覺了，看樣子是逃不脫這一关了，萬一我有个什麼好歹，八角坳的黨組織還在，反‘奪田’已經布置好了，我們能搞起來！以後再聯絡你找胡敏英同志，就是剛才來的那個女同志。你記着，她住西頭從北數第四個窩棚，門前有一棵小榕樹……”她指了指那籃菜，又說：“你可要想着把這籃菜帶上山去，這是我們繳的黨費！”

停了一會，她側耳聽了聽外面的動靜，又說話了，只是聲音又變得那麼和善了：“孩子，要是你能帶，也托你帶上山去，或者帶到外地去養着，將來咱們的紅軍打回來，把她交給盧進勇同志。”話又停了，大概她的心緒激動得很厲害，“還有，上次托你繳的錢，和我的黨証，也一起帶去；有一塊錢買鹽用了。我把它放在砂罐里，你千萬記着帶走！”

話剛完，白鬼子已經趕到門口了。她連忙轉過身來，摟着孩子坐下，慢條斯理地理着孩子的頭髮。我從板縫里看她，她还象

第一次見面時那麼和善，那麼安詳。

白匪敲門了。她慢慢地走過去，開了門。四五個白鬼闖進來，劈胸揪住了她問：“山上來的人在哪儿？”

她搖搖頭：“不知道！”

白鬼們在屋裡到處翻了一陣，眼看著泄氣了，忽然一個家伙發現了那籃子咸菜，一脚把籃子踢翻，咸菜全撒了。白鬼用刺刀拔著咸菜，似乎看出了什麼，問：“這咸菜是哪來的！”

“自己的！”

“自己的！干嗎有這麼多的顏色！這不是湊了米往山上送的？”那家伙打量了一下屋子，命令其他白鬼說：“給我翻！”

就这么問房子，要翻還不翻到閣樓上來？這時，只聽得她大聲地說：“知道了還問什麼！”她猛地一掙跑到了門口，直著嗓子喊：“程同志，往西跑啊！”

兩個白匪跑出去，一陣腳步聲往西去了。剩下的兩個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。

我原來想事情可以平安過去的，現在眼看她被抓走了，我能眼看著讓別人替我去犧牲？我得去！憑我這身板，赤手空拳也干個夠本！我剛打算往下跳，只見她扭回頭來，兩眼直盯著被惊呆了的孩子，拉長了聲音說：“孩子，好好地聽媽媽的話啊！”

這是我聽到她最後的一句話。

這句話使我想到了剛才發生情況時她說的話，我用力抑制住了沖動。但是這句話也只有我明白，“聽媽媽的話”，媽媽，就是黨啊！

當天晚上，村里平靜了以後，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。我收拾了咸菜，從砂罐裡菜窩窩底下找到了黃新同志的黨證和那一塊

銀洋，把孩子也放到一個籃子里，一頭是菜，一頭是孩子，挑着上山了。

見了魏政委。他把孩子攬到懷里，聽我彙報。他詳細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況以後，按照往常做的那樣，在登記黨費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寫上：

黃新同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繳到黨費……

他寫不下去了。他停住了筆。在他臉上我看到了一種不常見的嚴肅的神情。他久久地撫摸着孩子的頭，看着面前的黨証和咸菜。然後掏出手巾，蘸着草葉上的露水，輕輕地，輕輕地把孩子臉上的淚痕擦去。

在黃新的名字下面，他再也沒有寫出黨費的數目。

是的，一籃咸菜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，一個共產黨員愛黨的心怎麼能夠計算呢？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麼能夠計算呢？

1954年6月15日初稿

1954年11月8日三次修改

糧食的故事

吃罷了晚飯，我到縣人民政府去找郝吉標。

訪問郝吉標的事是今天才決定的。听寇縣長說，郝吉標是這裡的一個“老革命”，一九三三年的鄉工農民主政府主席。在老區游擊斗爭最困難的時候，他協助游擊隊作過很多事。現在就在縣政府的“老區辦公室”工作。

縣政府離我住的地方不遠，從一個丁字街拐彎，北面的一條街就是。我沿着大街走着。這個小城里的大街本來就不寬，路中心又平鋪着晒上了稻穀，顯得更擁擠了。那糧食大概是縣糧庫的吧，有幾個青年人在用推板把它推攏起來。

我一邊走一邊想：這個老革命該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

到了縣政府一打听，有人告訴我，郝吉標剛給幹部講了話，現在正在家呢。

郝吉標住的地方就在“老區辦公室”的旁邊，是一單間四角方方的小屋子。我敲了敲門，沒見回声；推開門一看，郝吉標正躺在床上，手里捏着只竹煙管，兩眼直直地盯着床頂子出神。見我是個生人，才慢慢地坐起身。

“好嘛！”我對他說明來意後，他回答道。一面慢條斯理地整着鞋子。我看出，似乎剛才他在想什麼事情，現在有意這樣來平

靜一下他的心情。

在燈光下看來，他已經是個老头了，雖然穿着一身半新的藍布制服，仍然掩不住他的年紀。看去約摸六十上下，前腦門的頭髮全禿光了，額角顯得很高，上面滿布着細細的皺紋。他的眼神顯得有些疲倦，我猜他是因為剛才講話累了，就說：“你剛剛作過報告，要是累了，咱就另找個時間談吧。”

“只是隨便談了談購糧的事，不累，”說着他站起身，神情有些激動，“咱這里头一次搞購糧工作，找全縣的幹部來布置任務，有個別幹部，稱斤掂兩的，怕任務重了完不成。嘿，這些年輕人，他們就忘了這些賣主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啦。咱這老根據地，四十歲往上的人，哪個不是刀山上爬、油鍋里滾過來的？打土豪分田地、三年游擊戰、八年抗戰、敵後堅持……二十多年來為的是啥？如今革命成了功，二次分了田，就等着建設了，他們有什麼舍不得？過去豁上身家性命也干，現在國家拿錢買糧食，倒怕他們舍不得了？氣不過，我就把過去我們鬧革命的事講了講。”

話一開頭就扯到正題上了。我說：“那就請你把給大伙講的事再給我講講好不好？”

他點了點頭，默默地摸過煙管，抓了把牛毛似的煙絲按到煙鍋里，猛吸了幾口。透過煙氣，我又在他臉上看到了剛進門時看到的那種表情——大概他又回到當時的情景里去了吧？半晌，他才抬起頭來，把椅子往前挪了挪，和我對着面談起來。

“現在說話，已經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一九三四年，剛交秋，我們這里的主力紅軍就參加長征去了。本來，我已經收拾好了東西準備跟上走，誰知通知來了，却是叫我留下做地下工作或者上山，堅持敵後的游擊鬥爭。好吧！既然組織上這樣決